

# 魏玛共和国史

下 卷

〔瑞士〕埃里希·艾克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 魏玛共和国史

(下 卷)

——从洛迦诺会议到希特勒上台

(1925—1933 年)

[瑞士] 埃里希·艾克 著

王步涛 钱秀文 译

宋钟璜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1994 年·北京

034473

*Erich Eyck*  
**GESCHICHTE DER WEIMARER REPUBLIK**  
Zweiter Band

Von der Konferenz von Locarno bis  
zu Hitlers Machtübernahme 1925—1933  
根据苏黎世欧根·伦奇出版社1972年版翻译

2090/27

WÈIMǎ GÒNGHÉGUÓ SHǐ

**魏玛共和国史**

(下卷)

——从洛迦诺会议到希特勒上台  
(1925—1933年)

[瑞士] 埃里希·艾克 著

王步涛 钱秀文 译

宋钟璜 校

---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省香河县第二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1094-2/K·194

1994年6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4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390千

印数 710册

印张 16 3/8

定价：14.70元

## 目 录

前言	1
第十一章 洛迦诺条约	3
第十二章 加入国际联盟、同俄国的条约和图瓦伊会谈	52
第十三章 国防军困难重重、马克思的倒台和重新组阁 (1926年10月至1927年1月)	87
第十四章 社会、经济和财政政策的问题	109
第十五章 马克思右派政府(1927年2月至1928年 6月)	126
第十六章 又一届大联合政府	155
第十七章 围绕杨格计划的斗争、施特雷泽曼之死和希 特勒的崛起	202
第十八章 大联合政府的瓦解	224
第十九章 从议会制到宪法第48条	251
第二十章 1930年的九月选举——布吕宁处于守势	275
第二十一章 关税同盟和银行危机	296
第二十二章 兴登堡再次当选和他的背后一箭	344
第二十三章 绅士骑士充当总理和政变者	387
第二十四章 从施莱歇尔到希特勒	440
德国历届政府情况(1926—1931)	479
注释	481
人名索引	503

## 前 言

我怀着对命运的感激之情写下了本书最后一章的最后一个字。这部书所用的写作时间比我所希望的要长。遗憾的是，一个人在其 30 岁的后五年中已不再能像年轻时期那样迅速和持久地工作了。然而一般说来，谁在这样的高龄还可以从事学术工作，那就有足够的理由向他表示感谢了。

按照人们通情达理的估计，随着这一卷的完成我同德国史告别了。因此，或许可以允许我对我的德国读者讲一句话。你们将会在本书中碰到使这一位或另一位产生异议的叙述。我只请求这样的读者不要用“流亡者的愤懑”这一方便的说法来消除自己同作者的内心争论。我绝不想给人这种印象：我忘却了我和像我那样的人以德国人民名义遭受的不公正。但是我很清楚地知道，我应当感谢我所受的德国教育和德国的精神生活，我有许多正直的、满怀真正人道主义精神的德国朋友，使我不受他们所暗示的那种说法的感情所支配，或者会影响到我的学术著作。如果说我有时相当清楚地说出我的批评，那完全是基于另外的考虑。和平地重建和发展我们的文明世界，没有德国人的热心合作是不可能的。但是只有当德国人在高度发展全世界公认的许多伟大才能之外也高度发展自我认识和自我批评的时候，当他们中间许多人不坚持把任何不幸都视作只是别人的罪责而对自己只是同情这一习惯的时候，上述那种合作才具有充分的价值。因此，用不明确的语言掩饰过去错误的历史学家是对未来的犯罪。

伟大的画家马克斯·利伯尔曼说过：“绘画就是省略！”这句话

也适用于历史学家,如果他不想限于编制年代记,而是试图进行生动的和相互联系地描述的话。当然,决定什么可以省略,总是主观性的;但是我认为,人们将不得不承认作者的这种主观的范围,如果只是由他所叙述的细节结合成一个整体的话。

为写本书第 11 至 24 章,我利用了古斯达夫·施特雷泽曼的文字遗产,这些文字遗产的照相复制品保存在本地的公共档案馆供我使用。我尊敬的朋友、退休国务秘书汉斯·舍费尔博士先生为我提供了一大批很有价值的记录和草稿;我从中学到了很多,虽然我并非总是赞同他的观点。我在上卷前言中表示感谢的奥托·格斯勒在这期间去世,不可能对本册进行预定的详细的商讨。但是我认为自己有责任通知:格斯勒对由拉本瑙所报道、由我在上册边码第 322 页重述的泽克特对艾伯特的答复“国防军支持我”的说法表示怀疑。格斯勒写信给我说:“这样的用语不适合泽克特。”除了我的老朋友、从前的议员奥古斯特·韦贝尔和奥斯卡·迈尔等等以外,对退休的中央部长冯·劳默尔先生和退休的领事亨利·伯恩哈德先生,我也有责任作出我的口头表示。我对所有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帮助过我的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最后,我还想纠正一处错误,这个错误是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出现在上卷的封套之中的。我从来不是国会议员。我只是先在夏洛滕堡、后在柏林当过市议员。

埃里希·艾克

1956 年 7 月于伦敦

## 第十一章 洛迦诺条约

11

陆军元帅冯·兴登堡就任总统新职不几天，外交部长即登门拜访，向他报告关于德国未来外交政策计划的设想。年迈的兴登堡为之震惊。施特雷泽曼所主张的，并且已开始实施的计划只不过表示德国方面对缔结国际协议的主动性，通过缔结这些国际协议可给予法国在德国进攻面前所深感缺乏的安全感。

早在弗里德里希·艾伯特时代已经开始执行这项政策。1925年2月9日路德组阁以后，施特雷泽曼向法国政府递交一份备忘录，提出讨论保证莱茵地区占领现状既有利于法国也有利于德国的条约设想。这份备忘录的历史背景可以追溯到两方面的根源：其一是备忘录自己提到的、1922年12月古诺政府提出的遭到否决的建议；其二是1924年10月国际联盟第5次大会通过的、关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日内瓦议定书”。日内瓦议定书包括一项大胆的尝试，即让所有国家在非正义战争的侵略面前能够获得绝对安全的内容，列入国际联盟的章程。为此目的，不仅需要扩建全面仲裁法庭体制，而且还要努力贯彻所有国家都要“逐个地和全体地”担保“给一个遭受侵略和威胁的国家提供援助”的基本原则（第2条第3款）。

日内瓦议定书的命运取决于各大国的态度。法国立即表示同意。代表法国的白里安在国际联盟大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称赞日内瓦议定书是为人类做的一件好事。<sup>1</sup>法国的盟友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马上仿效法国的做法。这两个国家无论在过去或是在将来都害怕德国的侵略，除了期待对它们国家的安全作出国

12

际保证以外，没有其他任何奢望。这是不言而喻的。现在要看英国的态度。英国是个大国，因为它很难成为侵略的目标，所以它更不会伸手援救一个遭到进攻而处于困境的国家。当时的工党政府中有些内阁成员如英国驻日内瓦的代表亚瑟·亨德森和帕穆尔勋爵等对日内瓦议定书很感兴趣。人们无法知悉工党政府的最后决定，因为工党政府在这之后不久在其 1924 年 10 月轻率举行的选举中遭到了失败。不过事情一开始就十分清楚，任何一届英国政府都必须小心谨慎地考虑英帝国自治领的利益，它毫无兴趣保证完全在它利益范围之外的欧洲边界的安全。在国际联盟中的加拿大代表在日内瓦大会上指出各民族的心理因素对此起决定性作用。他说：“在这种互惠的火灾保险情况下，风险不会均匀地分摊到每个国家。我们加拿大人虽然远离任何易燃物品，但仍生活在燃烧着的屋子里。”尽管集体安全的设想多么美好，多么伟大，但是它却遭到了严峻现实的冲击，人民或国家，只有当他们的切身利益明显或公开遭到危难时，它们才会准备去作出牺牲。

1924 年 10 月大选后，重新执政的鲍尔温保守党政府把外交大臣的职务授给奥斯汀·张伯伦。这位颇引起世人争议的约瑟夫·张伯伦的长子，在 30 多年的政治生涯中已经担任过很多大臣职务，但还没有担任过外交大臣。不过奥斯汀·张伯伦长期坚持研究外交政策。他对寇松勋爵的那套做法持批判态度。奥斯汀·张伯伦嘲笑寇松，说他做了一次动听的报告，或写了一篇深思熟虑过的外交照会之后，就相信万事大吉。<sup>2</sup>寇松很想重任外交大臣，但鲍尔温厌弃寇松并乘机宁愿同一个到最后时刻仍能坚持劳合·乔治主张的人和解。张伯伦外交政策方案的基本思想是坚持同法国订立协约，这也是张伯伦从青年时代起就具有的见识和偏爱。

但是，张伯伦却不乐意在日内瓦议定书上签字。因为签订议定书就意味着英国不仅要保卫法国还要准备保卫波兰免遭德国的



进攻。但是英国的社会舆论想对此事充耳不闻，因为波兰不仅在普通英国人的视野之外，而且还因为波兰对凡尔赛和约规定的波兰边界线，尤其是对波兰走廊是决不会感到高兴的。<sup>3</sup> 张伯伦在给英国驻巴黎大使的一封信中，以效法俾斯麦的措辞表达了这种立场。他说：“没有一届英国政府会为保卫波兰走廊而冒付出一名英国士兵的生命的风险。”<sup>4</sup> 如果联想到 1939 年发生的事件和奥斯汀·张伯伦的哥哥尼维尔·张伯伦的政策，这种论调是值得注意的。但在当时，奥斯汀·张伯伦的意见显然还不占上风。

1925 年 3 月 12 日，张伯伦在国际联盟大会上宣布英国政府拒绝签约，日内瓦议定书遂告流产。很久以来，英国的这一立场对欧洲各国政府来说也不是什么秘密，尤其对英国驻柏林大使来说，不是不了解的，他于 11 月底曾在伦敦同外交大臣详细讨论了英国的立场。<sup>5</sup> 达伯农勋爵当时成功地致力于在德国与英国之间缔结一项贸易协定，他把这项贸易协定看成是达到英德两国在政治上相互重新接近这一主要目标的一种手段，他为自己的这一努力能得到张伯伦的理解而感到欣慰。但是，他也看到，张伯伦并不满足于拒绝签订日内瓦议定书，而考虑采取另一种手段来满足法国的安全需要。几乎可以认为，对他来说最适宜的办法是建议缔结法英同盟条约。但是这位大使明白这样一个条约必然会把矛头指向德国，这对他接任柏林使团的任务是一种根本性的威胁，关于在必须解决法国安全问题这一点上，大使同张伯伦和其他左右英国外交政策的专家如格莱勋爵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难道就不能因此找到一条促使昔日的宿敌之间互相达成谅解的道路吗？

在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的遗稿中发现了一份 1926 年 2 月 28 日的记录——可能出自外交部国务秘书冯·舒伯特——谈到了 1925 年 2 月 9 日德国备忘录的来历。洛迦诺政策即由此而发展形成的。<sup>6</sup> 记录一开始是达伯农和舒伯特于 1924 年 12 月 29 日

的一次谈话。这位大使“顺便”提到安全问题，并对威廉·古诺总理 1922 年 12 月 9 日的建议表示赞赏。达伯农暗示对莱茵地区感兴趣的国家用条约互相承担义务而不互相诉诸战争的想法。舒伯特对这种暗示没有给予“实质性的”答复，但无疑立即向他的部长报告了。当时，施特雷泽曼处境困难，马克思政府几天以前刚刚辞职。协约国又发表声明说，由于德国反对解除武装规定的过错，他们不会在 1925 年 1 月 10 日从科隆地区撤军。这使德国舆论哗然。<sup>15</sup>但施特雷泽曼及时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和它所引起的影 响，他看到，法国的安全问题总有一天必须解决，他还认为协约国不撤出科隆地区同法国担心自己的安全有关。施特雷泽曼通过德国驻莫斯科大使勃洛克道夫—兰曹伯爵于 1925 年 4 月 7 日向俄国全权代表李维诺夫宣读了一项声明，详细说明了他的看法：“德国政府一开始就估计到，如果不以某种方式满足法国的所谓安全需要，法国就不会撤军。由于 1 月 10 日即将到期，法国即面临这样的选择：是甘心容忍英美当时在凡尔赛为反对法国军人党而付诸实施的关于莱茵地区问题的解决办法，还是想保住为继续执行那个军人党计划的可能性。当前的法国政府（赫里欧）看来并不愿意决定作出第一种选择。假如赫里欧政府不为法国得到取代 1919 年在凡尔赛拟订的、后来又失效的、与美英订立的保证条约的协议，因为这些保证条约说明了由威尔逊和劳合·乔治所承认的关于凡尔赛和约中解决莱茵地区问题的补充条款，那么赫里欧政府当然不会愿意，或者说无论如何不能够作出这种决定，也不能使这一决定成为现实。假如能缔结一项法—英—比利时三国条约，还通过同英国缔结扎实的军事同盟而得到加强，法国当然是最为欢迎的。……除了协约国之间的协定把矛头直接指向德国并使英法协约永久化之外，这一可能性从一开始就被排除了，因为英国断然拒绝了三国协定。如我们今天所知，最后一点是不完全正确的。但是，其他争

论的问题取决于德国积极参与解决安全问题的紧迫性，因为莱茵地区的解放取决于这一参与。另一方面法国还可能担心对德国人提出的解除武装的要求这样过分，致使在短期内……不能取消协约国的国际军事监督，也不能从科隆地区撤军。”<sup>7</sup>进一步剖析这种思想表明施特雷泽曼正是非常重视撤消协约国对德国的军事监督。

施特雷泽曼清楚地认识到，德国在安全问题上采取主动对提高德国的国际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他不能不看到当时德国社会舆论对采取这一步骤还不成熟，他也不能不看到会遭到来自右派的顽强抵制。这就是他力争右派参加新政府的原因之一。因为他坚信德意志民族党的部长们一旦进入了新政府，尤其是在确认继续执行迄今为止的外交政策的情况下参加新政府，就会赞同他的行动。<sup>8</sup>事实上，他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本人对这些先生们占有的优势。但如果这种情况果真出现，这个党就不得不听从他的指挥。这正是施特雷泽曼估计错误之处，他过高估计党的政治家的责任感而低估了民族主义鼓动宣传的力量。因此，施特雷泽曼最后表明他同时推行了不是互相配合而是互相拆台的两条政治路线。

1月20日，达伯农勋爵向张伯伦转交了施特雷泽曼的一份简短但内容特别充实的备忘录。在备忘录中，德国表达了对法国和解的良好愿望，承认了法国的安全要求是正当的；作为满足这一要求的途径之一，德国提出讨论对莱茵地区感兴趣的国家的一项协议，该协议不仅应该保证现有的占领状况，而且应该保证莱茵地区 17 的非军事化。

奥斯汀·张伯伦并不像施特雷泽曼和达伯农所期待的那样接受这项建议。张伯伦被请求对此要绝对保密。这样的做法反而引起了他的猜疑，似乎他被要求背着他的盟友同德国谈判。张伯伦

性格坦率，为人正直，对这一要求具有特殊的敏感性。实际上，施特雷泽曼根本没有想过要这么做，他只不过听从了英国大使的劝告。施特雷泽曼确实确实想防备过早地向公众透露他的建议，因为令人害怕的是，这不仅会在德国，而且会在法国惹起民族主义者的大喊大叫，这就可能会扼杀这个“婴儿”——这是达伯农和舒伯特对这项计划的称呼。在英国，它必会遭到这些集团的反对，他们要求一种像日内瓦议定书中规定的普遍性的和平保证，拒绝各国签订单独的协定。<sup>9</sup>

接着，施特雷泽曼又采取了第二个冒险步骤：2月9日向法国总理赫里欧递交了一份完全类似的备忘录。赫里欧说，他必须同他的盟国讨论这项建议，他首先只限于这一答复。所以，他允诺对建议严格保密。他也遵守了这个诺言。这样就谨慎地避免了在巴黎新闻界通常的泄密现象\*。

18 法国总理必须克服的实际困难是同导致日内瓦议定书失败的困难密切相关的。德国准备签订的保证条约涉及到它在西部的边界线。那么在东部的边界线又怎样呢？德国不仅认为它的东部边界线极不合理，是一种耻辱，而且对波兰人本身怀有一种几乎是普遍蔑视的态度。赫里欧对此是一清二楚的。尤其在德国认为缔结这项莱茵地区安全条约可以防止可怕的两线作战时，难道人们就不怕爆发一场战争冲突吗？德国为防止这一危险提供了什么样的安全保证？难道不应该要求德国也像在西部那样为承认在东部

---

\* 赫里欧的缄默有其有趣的一方面。1926年6月施特雷泽曼和法国驻柏林大使德·马尔热里在闲谈时流露了这一情况。马尔热里抱怨这份备忘录对他来说可算是自己在外交上的一种耻辱。赫里欧把这事连对他也保密。但在柏林已流传递了这份备忘录。马尔热里为了追查这件事，把搜集到的情报向巴黎报告，他根本没有想到德国已送交了这样一份备忘录。对此赫里欧向他作了答复并感谢马尔热里的关注，祝贺他搜集到的情报；——但实际上，这份备忘录早已在赫里欧的手中。（参见施特雷泽曼遗稿，第7328篇）

的边界现状提供同样的保证吗？施特雷泽曼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准备这样做；他也不可能这样做。德国舆论会一致拒绝作出这样一种保证。施特雷泽曼建议同一切愿意签订条约的国家缔结仲裁条约，然而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明确涉及东部边界。但是人们从这项建议中却得出结论，认为德国将不诉诸武力而只以和平方式改变它的东部边界。

英国外交大臣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德国建议的。3月24日，张伯伦在英国下议院对德国的备忘录进行了一些原则性的评论，从而首次向欧洲公众透露了内阁秘密讨论中所持的较为明确的观点。<sup>10</sup>张伯伦为这些谈判创造了良好的气氛，即他坚信德国政府为改善国际形势做了“坦率的和真诚的试探”，英国政府认真地审议了这项建议，希望大家同心协力使这项建议能获得丰硕的成果。他还谈到德国建议的内容并宣称：德国愿意承认迄今为止在和约的强制下接受的西部边界条款，将来自愿对此作出保证。但在东部边界，德国也愿意放弃以战争手段来变更它。“无论是西部，还是东部，德国都准备完全放弃诉诸战争改变和约规定的边界线的想法。”当然，德国怀着有朝一日“通过和平谈判、通过外交手段……或通过国际联盟的出色工作”改变其东部边界的希望。此外，张伯伦希望，西部的和平得以保持稳定这一事实本身，将对东部边界起到补充保证的作用。<sup>19</sup>

张伯伦对德国建议这一乐观的解释显然首先是说给法国听的。法国政府和法国舆论可以放心来，即便英国拒绝保证波兰的边界，波兰也毋庸担忧。但是，张伯伦很快领会到本应消除法国疑虑的事却伴随着引起德国猜疑的风险。坐在英国下议院楼座上聆听张伯伦演说的德国驻伦敦大使施塔默尔博士立即要求同张伯伦会谈，大使指责英国大臣在东方问题上的说明走得太远了。但是，张伯伦对此立即作出了强烈反映。“难道这意味着，为了达到

你们的政治目的，你们要保留在东欧发动战争的权利吗？如果是这种情况，我就马上回到下议院，收回我所说过的话，即我们将尽一切努力来促进德国的建议。”<sup>11</sup> 于是施塔默尔当然只好退却，张伯伦的解释就没有再受到德方的非议。但张伯伦事后说，如果他必须撤回自己的声明，那么他可能会立即辞职。他要求自己在法国和德国之间的这些艰难的谈判中充当“正直的掮客”这一角色。<sup>20</sup> 他在一封给英国驻巴黎大使克鲁勋爵的信中加上了一句话，“比起这些著名的空谈家还稍稍正直一些”。<sup>12</sup>

事实上，要为协约国拟出一个使巴黎和伦敦都满意的对德国政府的答复确实相当困难。谈判持续到6月。兴登堡当选为德意志共和国总统这件事也并没有使谈判进展顺利，而且在谈判结束前，法国又发生了政府更迭。赫里欧由于财政政策日趋困难的问题于1925年4月10日下台，接替他的是激进派的议会议长保罗·潘勒韦，他把外交部长的职务给了在1922年1月夏纳会议期间被雷蒙·普恩加来推翻的阿里斯蒂德·白里安。

从此，白里安又登上国际政治舞台。一直到施特雷泽曼逝世为止，白里安始终是施特雷泽曼的对手，最后终于成了他的朋友。白里安当然也重视维护胜利带给法国的利益和捍卫不容更改的凡尔赛和约。没有一个法国政治家能够作另外的打算或者有另外的表态。当然对于胜利者来说总是比战败者更显得息事宁人。但是，如果人们仅仅从中想说明白里安热中于开创一个和平天国，并通过国际组织巩固它，那就错误估计了他的本性。白里安是一名精明强干、有时是老谋深算的务实政治家，但同时他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对战争从内心深处深恶痛绝，不仅为了他的祖国，而且为了全世界渴望带来和平福音、渴望实现超越国界的人与人之间的谅解。白里安在法国议会上的一次长篇演讲中说，他在肩负法国总理的重任而为凡尔登战斗的那些日子里，有鉴于骇人听闻的

人类大屠杀而向自己发誓过，如一旦获胜，“他将全心全意地、全神贯注地、全力以赴地为和平事业献身，以制止这种残暴行为的重现”。<sup>13</sup> 对他来说，这样一种建议，即通过同数百年之久一直是敌对的邻国达成和平谅解以满足法国（自然也是他自己所同意的）的安全需要，是具有吸引力的。白里安作为一位务实的政治家非常了解，孜孜追求这一目标的政治家务必小心翼翼地对待容易引起公众舆论混乱的、民族主义的各种思潮，而且他也很清楚莱茵河彼岸的情况可能不会有另一种样子。施特雷泽曼 5 月 18 日在国会的一次讲话中抱怨，协约国政府一直没有具体告知它们认为可以谴责德国对解除武装条款有哪些违犯行动；而且他还指责协约国政府由于不从科隆撤军违反了他们本身签订的条约。白里安非常清楚，人们由于避免在安全条约谈判期间引起德国新的冲动，制止了递交关于德国违犯解除武装条款的照会。白里安猜测到德国外交部长对此也心照不宣。几天之后，他在法国参议院作了答复。“施特雷泽曼先生必定把他的讲话不仅针对听他发言的议员们，而且也针对公众舆论，因为没有他们的同意，任何一届政府都无法行事。因此必须看到隐藏在他讲话后面的事情真相。人们应该摒弃所有通过公众舆论强加于他的一种争论性质的东西，而从一位政治家的言论中只去发掘达到他真正追求的目标的东西。”<sup>14</sup> 接着，白里安在影射兴登堡的当选时说：“对我们来说，我不是不可能在施特雷泽曼的话里找到在大选后所预料到的某些粗暴的东西。”这真像一名政治家所说的语言，同时具有老练的策略家的灵活性，因为他使自己的批评家们无言以对。

法国政府于 6 月 16 日才向德国政府递交了一份答复施特雷泽曼 2 月 9 日备忘录的照会。其中包括着重声明法国的盟国——当然主要是英国——对此已表示同意。这是不言自明的，白里安只是用接受英国原则立场为代价才征得英国的同意的。照会中没

有包括英国保证德国东部边界的任何内容。白里安不得不满足于在德国和其东部邻国之间订立仲裁条约的要求。德国在其2月备忘录中早已说明了它在原则上准备签订这样的仲裁条约。但是恰恰德国方面却怀疑白里安所要的仲裁条约是否超出了施特雷泽曼建议所设想的范围。<sup>15</sup>更为重要的是，白里安强调，只有德国参加国际联盟，即在国际联盟理事会通知德国的条件下，缔结安全条约才是可能的。<sup>16</sup>

在安全条约得以缔结之前，还要在这些问题上在德国和协约国之间进行谈判。施特雷泽曼现在不得不看到，这些外交政策问题远不及内政上的困难来得严重。现在必须把德国的备忘录和法国的答复照会同时公布于众，这就必然引起报刊上展开热烈的讨论，而德国的报刊总是不会充满好意的。施特雷泽曼在6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我们的新闻界真是糟糕透顶。”<sup>17</sup>不久，事态的发展表明，施特雷泽曼通过接纳德意志民族人民党人进入政府而为他自己设置了多大障碍。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在参加政府时虽然声明同意继续推行施特雷泽曼所代表的外交政策，但这时他们却像施特雷泽曼日记中所说的那样，“准备退出，并要在适当的时候退出内阁”。

23 内阁最初的讨论已经使施特雷泽曼尝到了孤家寡人的滋味。只有一位部长坚定地站在施特雷泽曼一边，这就是同他一起在内阁工作的、唯一的党友交通部长鲁道夫·克罗内。反之，被认为同中央党接近的司法部长约瑟夫·弗伦肯却怀有坚决反对达成完全谅解的想法。施特雷泽曼写道：“他无法摆脱战争中的丧子之痛而念念不忘复仇。此人从这种立场看待整个事业。”<sup>18</sup>弗伦肯以前只不过担任州高级法院院长，从来没有在政治上扮演过重要角色。但是，紧接弗伦肯发言的是冯·泽克特将军，他赤裸裸地鼓吹：“我们想取得政权，只要我们掌有政权，我们就自然能够夺回失去的一



切。”<sup>19</sup>

这是地地道道的复仇战争的立场，因而同德国政府提出的缔结安全条约的建议的立场是完全背道而驰的。这项建议本来要让全世界相信，德国并不想追求新的武装，愿意更多地作为志同道合的成员加入旨在巩固和平的国际组织，而且只想通过和平谈判和谅解的途径寻求改善它的处境和边界问题，与之相反，泽克特将军却宣扬普鲁士军人一贯的强权立场，他们在失败中只看到重新武装和重新使用武力的要求，一刻也不怀疑在最后的斗争中将站在他们这一边的是大国，因而也就是胜利。

不容掩饰的是，无数德国人都会对泽克特以果断的将军气魄所表达的那种语调产生共鸣。难道这不正是德意志民族党人对这一条约建议所抨击的和他们的报刊慷慨激昂地向它们的读者所鼓动的东西吗？德国要放弃阿尔萨斯—洛林地区了！这是民族的耻辱！从材料上看，他们所谓的放弃只是重复德国早已通过签署和约郑重声明过的词句。因为在和约第3部分第5款明确无误地这样记载：

“缔约各方确认再次纠正德国 1871 年违背法国的权利和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居民的意愿所犯的非义行径这一道义上的责任，一致同意第 51 条。

根据……1871 年 5 月 10 日法兰克福条约割让给德国的领土……重归法国的主权范围。”

难道这样一种庄严的放弃是能随心所欲地说的吗？在全部历史中，哪里有过在一次大的战争中的胜利者把这一种自愿重申的放弃看成是战败国方面的一种偿付，而战胜国就必须用回报去挣得这种偿付？胜利的法国自然一直担心一个再次强大起来的德国可能会发动一场新的战争，以便从它手里再次夺回这个有争议的省份，而且这种畏惧心理实际上使法国困扰不安。但是这样的一